

文章编号:2095-0365(2020)01-0063-06

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境

——以 H 村级工业园为例

张 瑾, 郑林宏, 孙 岩

(山西大学 哲学社会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7000)

摘 要:广东省顺德区 H 村级工业园,作为“污染类邻避设施”的聚集地,在发展初期并未受到周边居民的反对,反而在现阶段的升级改造中面临多方阻力,表现出与传统邻避现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本文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出发,以 H 村级工业园区改造为背景,通过对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得出影响整个事件的三大关键因素:“污染类邻避设施”风险的不确定性、当地政府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个体理性的策略,其中个体理性作为核心要素发挥关键作用,体现出不同主体在个体理性选择下,会采取不同的策略,无法在意识及行动层面达成一致,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

关键词:村级工业园改造;集体行动;邻避现象;个体理性

中图分类号:C193.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xxbskb.2020.01.09

随着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环保意识也在逐步提升,更加注重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因环保问题而引发的社会冲突逐年增多,中国社会正在进入“邻避时代”^[1]。邻避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人们在享受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福利的同时,也有一部分人因受到邻避设施的负面影响而触发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性的抗议行动。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受到社会结构的制约、个体理性的影响,集体行动的发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本文的案例中,生活在邻避设施周围的居民,在受到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后,并没有采取集体性的抗议行为,反而在邻避设施建立之初秉持支持的态度,在发展后期对工业园区改造多加阻挠,这种与传统路径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式,体现出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新特点。

一、数据资料获取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笔者 2019 年 1 月 17 日到 2019 年 1 月 24 日,在广东省顺德区容桂街道 H 村级工业园进行的实地调查。通过个案访谈、参与观察的定性研究方式,对社区居民、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邻避设施企业主,进行经验材料的收集,共走访 36 人次,形成 29 个有效访谈文本,其中普通居民 19 位,企业主 2 位,居委会公职人员 8 位。在访谈对象的选取上,出于对访谈对象差异性的考虑,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保证样本获取的典型性和有效性。将此案例的利益相关者分为三类,首先是基于居委会提供的名单材料,对企业主和居委会公职人员,进行简单的随机抽样。对居民访谈对象的抽样主要依据以下两点,一是考虑到 H 工业园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存在异

收稿日期:2018-05-2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基督教传播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18CSH004);山西省 2019 年度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农村地区父辈因婚致贫的现象及其形式机制”(2019SY059)

作者简介:张瑾(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城乡社会学。

本文信息:张瑾,郑林宏,孙岩.村级工业园改造过程中集体行动的困境——以 H 村级工业园为例[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4(1):63-68.

质性,因此在对居民进行抽样时,将居住地与工业园的距离远近作为考虑因素,选取访谈对象的居住地,尽量均衡分布在H工业园的各个方向。二是考虑到H工业园内外来人口的占比是本地人的8倍,因此将户籍身份作为抽样的考虑因素。本文从集体行动中行动者的角度出发,以H工业园作为依托,对已获得的访谈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分析整个事件产生与演变的内在逻辑,梳理出从“支持”到“反对”的纵向发展脉络。

二、文献梳理

(一)邻避文献梳理

邻避作为一个舶来词,最初由O'Hare首次提出,是指生活在邻避设施周围的居民,因受到负面影响而产生集体性的抗议行为,用以反映美国工业发展初期的居民抗议行动^[2]。关于邻避的文献大多围绕公民个体理性选择、政府职能失灵两个主题,并且邻避事件的发生地以城市为主,以邻避现象的产生原因、解决策略为主要内容,将居民作为推动“邻避现象”发生的主体。邻避设施作为邻避现象产生的直接缘由,也是研究的基础所在。本文案例中所涉及的邻避设施主要是电镀厂、包装厂、电器厂、印刷厂等,属于“污染类邻避设施”,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空气、水、土壤及噪音污染,对于污染所引起的身体伤害、财产损失,具有潜在性和间接性,因此这类设施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很高的风险不确定性^[3]。

多元利益主体的冲突与分化,是邻避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邻避现象的产生,往往是因为居民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正式制度得到解决,因而采用非理性的抗争行为、非正式的途径去表达。邻避现象的发生,还与开放决策机制缺失、风险沟通的缺位有关^[3]。邻避现象的发生,是由于居民受到邻避设施负面外部性影响、决策不公开透明、风险补偿机制不合理、社会文化环境的互相作用,将主观感知下社会风险转化为社会冲突^[3]。

(二)集体行动的逻辑与困境

西方集体行动理论演化已久,其中结构主义者认为,结构才是集体行动的本源,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所采取的行为完全受到结构的支配,集体行动被社会结构所决定;其次是理性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曼瑟·奥尔森,认为个体行动者在集

体中通过权衡收益—成本,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以此决定是否加入集体行动;最后是意识形态理论,对集体行动的发生呈乐观态度,个体行动者依据情境框架,将客观事实转化为个体的认知,随后通过不断的建构形成社会共识,最终促成了集体行动的发生。西方集体行动理论将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和理性计算,都视为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并且要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下发挥作用^[4]。

传统的集团理论认为,依据一种常规的思维逻辑,有着共同目标与利益的人们会自发集结起来,通过集体的力量去实现共同的利益,但这一常规集体逻辑的前提,是把集体中的个人,当作同质化的行动者,而现实的情况却是恰恰相反。理性选择理论将传统的集团理论,进行重新的拓展与完善,认为行动主体在参与集体行动前,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权衡,因此个体利益最大化,并不能确保集体行动利益最大化,个人的理性行为,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对于个人而言,如果可以通过个体行动实现纯粹的私人利益,并且这种行动方式,比集体行动更为有效,那么集体的存在,对于个人来讲是毫无价值的,同时集体行动的发生,更需要一种情感逻辑的唤起,需要主观情感和客观利益一起作为动力^[5]。因此正是由于个体存在理性的功利主义行为,一旦将其组成集体,会导致集体意见不统一、缺乏选择性激励,从而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6]。

三、H村级工业园发展背景下集体行动困境

(一)发展初期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的H社区,面积5.3 km²,位于顺德南部接壤中山市,本地人口5 000人左右,外来人口将近40 000人。顺德作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区域之一,其工业产业辉煌成就的背后,存在着诸多隐患,其中那些高污染、低产能的工厂,难以最大限度发挥土地的利用价值,与环保、集约、高效的发展方向相悖,工业发展初期野蛮生长,所带来的历史欠账正在逐步凸显。H村级工业园作为顺德工业发展较早的一批,2000年之前,H社区以发展农业为主,辅之村办企业,校办企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2000—2003年,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村委会作为牵头

人,以每亩 3 万元的价格,将土地从农民手中征收,用来招商引资,在巨大收益面前,很多当地村民都愿意将地卖出去。但由于前期规划不到位,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对于企业的进入缺乏规划,大部分是低端的中小企业,只有小部分科技型企业,并且住宅区与工业区连成一片,给周围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本文将 H 村级工业园内高污染、高耗能的 100 多家小型企业,界定为邻避设施。但根据笔者的走访,在 H 工业园发展初期,居民主体并没有形成集体性抗议行动,甚至对此秉持“欢迎建在我家后院”的态度。

(二) 发展后期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土地作为经济发展的稀缺性资源,H 社区粗犷、低端的工业发展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的发展。2018 年顺德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将村级工业园改造,作为顺德“头号工程”重点推进,H 村级工业园在政策号召下,开始了园区的改造升级,目标是要“清理淘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强化监管一批”,^[7]在政府强有力政策的推行下,村级工业园的升级改造仍然面临巨大阻力。在改造的过程中,一些小厂房面临迁出、关停的风险,大部分厂房的租约,还有几年甚至十几年才到期,如果此时要终止合约,对于房东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村级工业园区改造计划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居民的强烈反对。

H 村级工业园作为典型案例,在建厂初期并

没有受到村民的反对,更没有集体性的抗议事件发生,反而呈支持、欢迎的态度,顺利地将工厂建在居住区周围,但在发展的中后期,面对村级工业园的升级改造,一些原住村民持反对的态度,对村级工业园的改造形成阻力,这种特殊的发展路径,与一般意义的邻避现象恰好相反,体现出集体行动的困境。

四、集体行动视角下的多元主体

(一) 普通居民

H 社区的居民由本地村民和外来人口共同构成,其中本地人口 5 000 人左右,外来人口将近 40 000 人,以四川、湖南、河南、广西人居多,属于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年龄在 40~50 岁。

邻避现象发生地多为城市,在城市中建立的邻避设施,对于当地居民是百害无一利。依据表 1,H 村级工业园所占用的土地,为农民手中的集体用地,从建立工厂之初,对于原住村民就有可观的经济收益,并改变了昔日落后的农耕、渔猎的生存局面,因而基于个体理性的选择,当地村民做出了支持工厂建立的决定。但在后期工业园改造的阶段,厂房的拆迁危及到村民的经济利益,因此做出了反对的理性决策;对于大多数外来务工人员,工厂是主要的收入来源,个人生活质量、环保意识提升,还不是外来人口认知与行为的重点,因此他们对于工厂的建立和改造,持无所谓的态度。

表 1 H 社区受访者对 H 工业园改造前后态度描述

居民构成	特征描述	初期态度	改造中态度	原型实例
本地村民	受访者(WY) 年龄 54 岁/经营饭店	支持	无所谓	“经济发展有利有弊,如果带来经济发展,又考虑环境问题,就有矛盾存在,肯定是先发展经济,保护环境没有发展经济都是空谈。”
	受访者(ZZN) 年龄 72 岁/出租房屋	支持	反对	“我是老人了,这个厂房是我来收租的,给政府改造之后,我没有那个租金收入,说是改造,会不会又拿那块地弄污染企业,另外是不是给我利益最大化啊。”
	受访者(HGL) 年龄 35 岁/出租房屋	支持	反对	“那个利益是比环境重要的,那些有钱的多久不在这住,剩下在这住的很少,我家也不在这住了,改造后只能给一些补偿了,直接卖给开发商,不能给租户了。”
外来人口	受访者(YTZ) 年龄 68 岁/无收入来源	无所谓	无所谓	“环境好不好也一样,都是老婆婆们住在这里,年轻人都去住高房子了,没得钱就住在这里嘛。”
	受访者(LFM) 年龄 45 岁/工厂打工	无所谓	无所谓	“在这住的就是在这打工的,没有钱才出来,来这也是混口饭吃,我们农村人没什么其他要求,只要能过就行。”
	受访者(KY) 年龄 56 岁/工厂打工	无所谓	无所谓	“我不清楚环境有没有影响,周围工厂那么多,肯定有污染,打工就打工,做生意就做生意,没有谈过这些问题。”

注:数据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针对工厂污染引起的集体性抗议活动,还需要组织与资源。数倍于本地人口的外来人口,来自于中国的四面八方,不同的语系、不同的文化让他们很少沟通,再加上工厂高强度的工作,几乎没有时间顾及他,因此组织动员作为集体行动的关键,在面对复杂的人口构成时,成为了难以达成的事。集体行动所需的资源同样难以获取。集体中的旁观者因为诉求不强仅仅在观望,而参与者在不断权衡收益与成本,试图不让自己成为“被搭便车的人”,因此即使有共同利益目标的人聚合在一起,也难以引发集体性抗议行动。集体行动作为一种社会冲突,并不是居民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并且这种手段的采取,需要付出高额的成本,最终导致集体行动陷入困境。

(二) 企业主

在H村级工业园内,私营企业共有600多家,其中有一定规模的50多家,以金属、印刷、家电生产为主,一些中小企业的生产率低下、空间利用率不高、高耗能高污染,成为了村级工业园改造的重点。中小企业对于村级工业园改造,所持的态度是消极顺应,等待当地政府的改造政策,再进行下一步计划。恒鼎工业园作为大型电镀工业园区,是村级工业园改造的成功案例、示范项目,体现出大型企业顺应形势主动出击,逐步提升企业的价值,降低耗能与污染,力求在这场村级工业园升级改造中站稳脚跟的决心。恒鼎园区的顺利建成,将楼加高,污水、废气统一处理,大大减轻了对于H社区的环境污染,让电镀生产不再成为污染的主要来源。大工厂与中小厂的不同应对策略,是基于其个体理性价值立足点的不同,但又存在着共同点,那就是工人的安全生产,工厂的环保生产是必须保障的头等大事,为“污染类邻避设施”风险系数的降低做出努力。

(三) 当地政府

由于当地政府初期缺乏合理规划,而导致工业发展呈现野蛮生长,如今为了扭转工业无序发展的局面,保住第二产业的基础性地位,实现实体经济的创新与振兴,开始对H村级工业园进行改造,并成为该项目最强有力的推动者、决策者。园区改造项目从开始到推进,每一步都通过村民代表大会的决策才得以实施。线上的微信群、公众

号,也都是村民们反映问题的平台,在平台上解决村民的质疑,也是村书记推动工作的主要方式,表达诉求渠道的通畅,缓解了社会冲突的爆发,让社会安全阀机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将H工业园升级改造,体现出政府对于多元目标的追求,其中电镀厂作为高污染的代表,是政府一直给予关注的重点,也是改造的重点,电镀厂的顺利改造,已经不再成为环境的隐患,但对于普通居民而言,他们只关注自家周边工厂所带来的污染,很多居民并没有切身感受到,园区改造对于环境的改善,因此对于H村级工业园改造存在质疑甚至反对。

五、影响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要素分析

集体行动的发生条件包括环境因素、冲突的价值观、相对剥削、社会控制机制崩溃^[8]。本文在集体行动理论的指导下,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对29个访谈样本进行梳理与分析,从中分析出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三大因素,并将典型分析案例呈现在表2。

在质性分析方法的指导下,将造成集体行动困境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污染类邻避设施的风险,它具有不确定性,作为客观因素,表现出动态性的特征。所谓的风险不确定性,一是指邻避设施所带来污染的不确定性;二是指在H社区内的多元主体对其认知的差异。首先就普通居民而言,由于其对于污染类邻避设施的认知水平有限,并不能对于其产生的污染做出明确的感知及判断,并且大多数居民都有在工厂工作的经历,很容易在生产过程中,直接受到工厂的污染,在回到工厂附近的居住地时,形成明显的环境反差,相比之下居住地的环境优于工作地,因此对于居民而言,即便感受到邻避设施所带来的污染,其敏感程度也不会很高。其次对于当地居委会公职人员,将H村级工业园区产生的污染加以管控是职责所在,并且最为当地所诟病的电镀城已经完成改造,当地政府在降低邻避设施风险性上做出了主要贡献。邻避设施企业主,把生产过程的环保问题看作头等大事,一旦环保不达标,工厂便面临关停的威胁,即使出于成本考虑不能做到零排放,但其对于环保的把控也是十分严格的。从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邻避设施多带来的风险性,都在各方主体的把控之中。

表 2 集体行动困境形成关键要素分析

多元主体	居民	政府	企业主
邻避设施的风险不确定性	受访者(ZM):“在这两年查环保,厂里设备比较好,没什么大问题,气味没什么,没什么大碍,没什么污染。” 受访者(CRY):“感觉电镀厂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一般,没有影响吃水,空气有时候也会受影响,也不知道这里居民有没有抱怨,我反正就是来这里打工的。”	受访者(HHB):“政府所有工业区的电镀企业都要关停,关停了之后,恒鼎工业城就建起来了,污水要集中处理、回收利用,基本这个项目就是示范项目,环保是达到标准的。电镀的名声也不好听,那些群众就认为所有的罪恶之源就是电镀城,成为了替罪羊。”	受访者(YZ):“喷涂就是粉末的,两种,一种是粉末一种是液体,我们主要是粉末,都做了二级回收,安全生产部门抓的紧,安检、环保,消防都抓的紧。”
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	受访者(ZL):“环境这边还比工厂里强,就是喝自来水,有事情找居委会,报警啊,他们给你处理的,还有那个专门的外来人口管理的。” 受访者(HX):“我们有不到 5 000 股东,代表 88 个,他们觉得我们不能代表他们,每个方案都进行一次表决,因为他们不相信,我们股东代表都要和他们说清楚。”	受访者(HHB):“我自己也搞了一个群,大家摊开去讲,天天直播,村民向书记反应问题。19 年除了公众号,我还要做电视台,做视频,把我的工作公布出去,完全公开。搞线上线下,线上微信群、公众号,电视台,报纸也要做,给老人看。”	受访者(HDF):“经过举牌,拍卖,获得了手续,和现在民营企业差不多,承接这个项目,很透明的,牵涉到维稳。”
个体理性	受访者(LLY):“根在老家还在老家,如果我们赚到钱还是回老家,因为老家空气什么的都比这里强。” 受访者(GSW):“95 年开始来厂子了,我家地也卖了,我天天上班,也不知道,我家股很少,我天天就是上班,别的不关心。” 受访者(LY):“如果不让收租了,那没办法生活的,肯定不行的。”	受访者(HHB):“村级工业园区的改造还会得罪很多人,原来一直收租的租户,把他赶走又没有土地给他,所以改造阻力非常大,最大阻力在于既得利益者,所以利益竞争非常厉害。”	受访者(HDF):“我这里就没有改造,政策还没有落实,差不多也要快改造了,这些得问领导。以后估计要搞厂房搬迁了,能做下去就做,做不下去再说。”

注:数据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而成。

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这一关键因素之所以可以发挥效用,与其所处特定社区这一背景环境密不可分。城市邻避事件频发,与当地政府管辖事物繁多,政府方与居民方之间的沟通具有明显的延时性,决策即便是通过合法程序产生,也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居民容易产生不公平感、被剥夺感,利益诉求通道不畅,只能采取非正式途径去争取。而 H 社区管辖范围小,5 000 多原住村民,设有 88 个村民股东代表,定期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线上的微信群、公众号,线下的报纸、居委会,让居民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多样化,居委会公职人员可以及时处理居民的诉求,在邻避设施建立初期,可以将对于邻避设施产生的不满情绪通过正规渠道表达,并得到政府方的回应与处理,不至于升级到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个体理性作为事件发生的核心要素贯穿始终,并且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策略^[9]。出租房屋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本地村民,在前期工厂带来丰厚租金的利益下,是完全支持的,但作为村级工业园改造升级的工厂房东,一部分中小

企业被关停、迁出,将会直接损害村民的经济利益,再加上之前受电镀厂的影响,一些村民担心会进驻污染更为严重的企业,因此对村级工业园改造多加阻挠。外来人口或是没有土地租赁的本地村民,不管是改造前还是改造中,由于整个事件不会对其工作生活产生直接或负面影响,因此大多数是不在意的。

总体而言,本文依托集体行动理论,将关键要素归结为三点:污染类邻避设施的风险不确定性、当地政府沟通决策机制公开透明、个体理性。其中邻避设施,作为邻避现象发生的基础条件,其风险的不确定性,作为客观因素起到影响作用;沟通、决策机制的公开透明,是作为结构上的影响因素;个体理性则起到决定性作用,并不断促使其他两个因素发挥最大效用,可以说个体理性因素,较其他因素影响更为显著。

六、结语

H 工业园区作为新的组织进入到当地的生活,本身会组织起当地的经济、社会关系、文化,人

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10]。当地居民与邻避设施,已经构成某种意义上的均衡关系,当面临改造的时候,这种平衡关系即刻被打破,既有的社会关系、人们的观念、组织人们生活的社会关系都会发生改变。因此在H工业园区建立之初,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居民对此秉持欢迎态度,园区在此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与当地形成平衡稳定的关系状态,但在工业园区改造的过程中,这种平衡局面被打破,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人口,出于小农经济思想的束缚,他们往往不会追求经济利益的最

大化,而是追求一种平稳的收益状态,村民经济利益受到损失,产生高度的不安全感,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维护,对于工业园区改造多加阻挠,而政府方则是从大局出发,追求多元的利益目标。在集体行动困境的背后,奉行的是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贴近人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关怀,更符合人们对现实的普遍理解,与多数人的价值观产生了共鸣,^[11]是基于不同阶层背景下的理性选择,具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这是由于个体理性而导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影响了整个事件的走向。

参考文献:

- [1]赵小燕. 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67(2):36-41.
- [2]胡象明. 敏感性工程社会稳定风险事件——过程模型和参与者行动逻辑[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6(2):58-62.
- [3]王佃利. 邻避困境:城市治理的挑战与转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1-70.
- [4]曾鹏, 罗观翠. 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关于集体行动动力机制的文献综述[J]. 开放时代, 2006(1):111-123.
- [5]郭景萍. 集体行动的情感逻辑[J]. 河北学刊, 2006, 26(2):81-86.
- [6]曼瑟·奥尔森. 集体行动的逻辑[M]. 陈郁, 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8-120.
- [7]丁媚英, 陈嘉敏. 顺德:打好村级工业园整治牌[J]. 环境, 2018(1):31-33.
- [8]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李强, 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648-650.
- [9]李伟.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J]. 青年研究, 1999(1):44-47.
- [10]袁方成, 邓涛. 从期待到实践:社区社会组织角色逻辑——一个“结构—过程”的情境分析框架[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58(4):20-28.
- [11]夏瑛. 从边缘到主流:集体行动框架与文化情境[J]. 社会, 2014, 34(1):52-74.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Industrial Park: Take H Village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Zhang Jin, Zheng Linhong, Sun Ya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Shanxi, 030000, China)

Abstract: H village-level industrial park in Shunde district, Guangdong province, as a gathering place of “pollution-type nimby facilities”, is not opposed by surrounding residen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but faces various obstacles in the current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showing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evelopment path from the traditional nimby phenomenon. From collective action theory perspectiv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H village industrial park transformation, the interview data are qualitative analysis, including thre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whole event: uncertainty of “avoid pollution adjacent facilities” risk, the loc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and the strategy of individual rationality. The individual rationality as the core elements plays a key role, reflecting different strategies of the different main body under the individual rational choice. It is unable to agree in consciousness and action level, causing the dilemma of collective action.

Key words: village-level industrial park reconstruction; collective action; nimby phenomenon; individual rationality